



21世纪的中日关系

The 21st Century's
China—Japan Relations

金熙德 / 主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21世纪的中日关系

The 21st Century's
China—Japan Relations

金熙德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 / 金熙德主编.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5366-8907-7

I. 2... II. 金... III. 中日关系—研究—21 世纪
IV. D822.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3595 号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

21SHIJI DE ZHONG RI GUANXI

金熙德 主编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杨亚平

责任校对: 何建云

版式设计: 钟丹珂

封面设计: 黄俊棚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 240mm 1/32 印张: 16.25 字数: 433 千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366-8907-7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言^①

日本是西太平洋中的岛国，与中国隔海相望，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中日相互交往已有 2 000 多年的历史。

日本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占总面积的 99.37%)和 6 800 多个岛屿(其中，面积在 1 平方公里以上的有 340 个，55 平方公里以上的有 48 个)组成。日本国土面积约 37.8 万平方公里，约为中国国土面积(960 万平方公里)的 1/25，略小于云南省(38 万平方公里)。目前，日本约有 1.28 亿人口，是中国人口(约 13 亿)的 1/10。

在当今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日本占有十分独特而又重要的地位。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近年来中日各交往领域之间的极大失衡与反差上：一方面，中日经济与民间交流快速发展，共同利益不断增大，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另一方面，中日政治、安全关系及民族感情却持续恶化，围绕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的政治摩擦频频发生，相互戒心日益加重。

首先，日本是中国周边经济实力最雄厚的邻国，同时也是中国

^① 引言作者为金熙德。

最重要的经贸与民间交往对象之一。

二战以后,日本充分利用了一系列有利的内外条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日本 GDP(国内生产总值)^①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相继超过英、法、西德等西欧主要国家,70 年代后期超过苏联,从那以来,一直保持着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在这一时期,中国则因种种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在经济发展方面大大落后于日本。1978 年启动改革开放进程后,中国开始急起直追,正在逐步缩小与日本之间曾经巨大的经济差距。

从静态看,2006 年,日本实际 GDP 为 51 万亿日元,按 1 美元折算 115 日元计^②,约等于 4.8 万亿美元;而中国 GDP 为 20.94 万亿元^③,按 1 美元折算 7.8 元计,约等于 2.68 万亿美元。日本以中国的 1/25 国土、1/10 的人口,其按美元计算的 2006 年 GDP 却为同年中国 DGP 的约 1.8 倍,人均 GDP 则更是约为中国的 20 倍。从总体上看,目前日本在经济总量、资金实力和技术水平上依然领先于中国。

另一方面,从动态看,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经济则已结束高速增长期和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追赶期而进入发达国家型低速增长期。因此,中国在经济规模上正在快速追赶日本,在经济质量上逐步缩小与日本的差距。中国“改革开放元年”——1978 年,

①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在进行国民收入核算时所用的指标主要是 GNP(国民生产总值),1993 年联合国统计司要求各国改用 GDP(国内生产总值),它是指一国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物品(包括有形的物品与无形的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从比较的观点看,GDP 是在“一国领土范围内”由本国人和外国人生产的价值的总和;GNP 则是“一国居民”在国内和国外生产的价值的总和。

② 近年来,日元兑美元汇率在约 1 美元折算 103 ~ 122 日元的范围内波动,以美元计算的日本 GDP 也随之波动。日本 GDP 统计分为名义 GDP 和扣除物价变化因素的实际 GDP。本数据出处:<http://rank.nikkei.co.jp/keiki/gdp.cfm>

③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 年 2 月 28 日。

中国以美元折算的 GDP 为 1 473 亿美元,日本 GDP 约为 1 万亿美元,中日 GDP 之比约 1 : 6.8^①;1990 年,以美元折算的中日 GDP 之比进一步扩大为约 1 : 10;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日本则因“泡沫经济”破灭而进入 10 年萧条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呈现加速追赶日本之势。以美元计算,1990 年中日 GDP 之比为 1 : 10,1995 年缩小为 1 : 5,2004 年缩小为 1 : 2.4,2006 年进一步缩小为 1 : 6 稍多,足见这一差距正在缩小^②。

2006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 1.76 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3.8%,继续超过日本,居美国、德国之后而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这一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约 694 亿美元,远远超过日本而居世界最前列。2007 年 3 月底,中国(不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外汇储备达到 12 020 亿美元,超过同期日本的外汇储备 9 089.58 亿美元而继续居世界第一位。

据一些国际组织测算,以美元计算的中国 GDP 可能在 2016 ~ 2020 年期间赶上日本,然后将继续超过日本。如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法计算^③,不少权威性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均认为,目前中国的 GDP 已超过了日本,两国的人均 GDP 之差也并没有以美元计算时那么大。中国在一系列主要产品产量和主要商品消费等重要经济指标上已经赶上或超过日本,在科技和对外投资方面也在急起直追^④。

① 1978 年中国 GDP 据胡锦涛 2006 年 4 月 21 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

② 中国 GDP 1978 年为 3 624 亿元人民币,2006 年为 20.94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约 58 倍以上;而按美元计算,则 1978 年为 1 473 亿美元,2006 年约为 2.68 万亿美元,增长 18 倍以上。

③ 以一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来计算其国内生产总值,不能准确地反映该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购买力平价法则把一国货币在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和在美国国内美元的购买力相比,形成购买力平价,据此折算成一国国内生产总值。以此法计算,中国 GDP 大大超过了按现行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换算的 GDP。国际上有关中国国力计算的讨论,参见陈岳:《中国国际地位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1 ~ 23 页。

④ 关于中日国力对比及其影响的理论分析,详见本书第五章。

日本无疑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伙伴之一。

在贸易领域,日本自 1993 年以来连续 11 年占据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中日贸易额从 1990 年的 129.3 亿美元猛增至 2006 年的 2 073.6 亿美元,增长 16 倍以上。由于 2004 年以来中国与欧盟和美国贸易的增速比中日贸易更快,这一年起日本已退居中国第三贸易伙伴的位置。尽管如此,中日、中美、中欧三对贸易额相差不大,三者形成了支撑中国外贸的鼎足之势。况且,欧盟是由 27 个成员国构成的,因而中欧贸易不能与中日贸易简单类比,实际上比日本更大的贸易对象国只有美国。例如,2006 年中日贸易额相当于同年中俄贸易额(333.9 亿美元)的 6.2 倍、中德贸易额(781.9 亿美元)的 2.65 倍,但少于中美贸易(3 430 亿美元)以及中欧贸易(2 723 亿美元)。

据日方统计,2004 年,中日贸易额为 22.2 万亿日元(含日本与香港贸易),日美贸易额则为 20.5 万亿日元,二战结束 60 年来,前者首次超过了后者。这无疑是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重大转折,也是对日本已固守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美)”心理的强烈冲击。据日本财务省 2006 年度贸易统计速报(通关数据),2006 年,日中贸易总额(不含日本与香港贸易)为 25.43 万亿日元,比前一年增长 16.5%,中国大陆单独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与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的贸易总额为 25.16 万亿日元,日中贸易与日美贸易的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

近年来,中日贸易的发展呈现出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双赢结构日趋明显、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比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逐渐加大等特点。据中方统计,20 世纪 70 ~ 80 年代,中日贸易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最高时曾达近 30%;这一比例 1990 年下降为 11.2%;1996 年重新上升到 20.7%;此后呈下降趋势,2006 年降至 11.8%。另一方面,中日贸易在日本外贸总额中的比例则从 1990 年的 3.5%上升到 2006 年的 17%。显然,中日贸易的相互依赖结构已经发生了逆转,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已大于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

度。近年来,中日贸易拉动日本贸易、“中国特需”拉动日本经济复苏的作用日趋明显。

在直接投资领域,按国别计算(即除了港、台地区对内地直接投资以外),日本多年占据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对华投资国的位置^①。2005年,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金额 65.3 亿美元,较 2004 年增长 19.78%,创历史新高;截至 2005 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 35 124 个,合同投资金额 785.7 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 533.7 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累计总额 10.8%^②。2006 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上年同比下降 29.6%,实际投入金额 45.98 亿美元,居国别第一位。

近年来,日本大型汽车、电子骨干企业正在改变以往那种对中国宁愿出口成品,而不太热心投资建厂、不愿转移先进技术的消极姿态,开始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而且日益注重把最新技术应用到在华投资企业,并把一部分研究与开发(R&D)中心和开拓新市场的营销中心也转移到中国内地来。

日本对华投资的双赢效果十分明显,它给中国带来了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升了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促进了其产业装备的技术进步;同时,对华技术出口也延长了日本产品技术的生命周期,使之获得丰厚的利益回报;在华投资设厂,也给日本过剩资金找到了良好出路,获得了利益回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效果。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1990 年为 0.6%,2001 年上升为 4.5%,2006 年度则更是上升到 12.2%。日本对华投资也扩大了中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和居民收入。目前,在日资(包括中日合资)在华企业的直接就业人员已经超过 100 万人,与这些企业相关的配套、服务、流通企业就业人员则达 920 万人。2004 年,日资企业缴纳税收约 490 亿元,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

① 2004 年,韩国的对华单年度投资额为 62.5 亿美元,首次单年度超过了同年日本的对华投资 54.5 亿美元。

② 张季风:《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载《学习时报》,引自:<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xxsb/1173036.htm>。

贡献度正在不断提高。

然而,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领域,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也在相对降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引进外资中所占比重 1990 年为 14.3%,而 2005 年则下降到 10.8%;另一方面,中国的对日投资虽然起步较晚、规模尚小,但也已开始迈出坚实的步伐登陆日本列岛,日本股民也越来越醉心于在中国的发展中圆其“致富梦”,热心购买中国上市企业的股票。

政府间资金合作是中日经贸关系的又一重要领域。日本政府于 1979 年 12 月首次承诺对中国提供以日元贷款为主、以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辅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稳定周边的外交目的、开拓市场的经济目的、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回报心理,是日本对华提供政府援助资金的三大动机。迄今为止,日本已为中国的交通、电力、通讯等“硬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和环保、扶贫、人才培养等“软环境”社会发展领域提供了 3.2 万亿日元以上的政府日元贷款、约 3 000 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以及数万亿日元的其他形式政府优惠贷款,成为对中国提供政府间经济合作资金最多的国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些资金在中国经济的“起飞(take off)”阶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①。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日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使其对华提供政府援助资金的目的得以充分实现。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大和日本对华政府资金合作规模的缩小,2005 年日本对华日元贷款降至 748 亿日元(不足 9 亿美元),其在中国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由最高年份 1994 年的 27%、2000 年的 10.4%降至 2006 年的 3%以下,在中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更是下降到 0.3%^②,与 2007 年 3 月底中国外汇储备 12 020 亿美元、2006 年底超过 16 万亿元的中国居民储蓄存款

① 关于日本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详见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第六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

② 日本政府已决定 2008 年停止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2006 年 3 月又决定冻结对 2005 年度对华日元贷款的审议,6 月初又予以恢复。

相比,日元贷款的比例更是显得相对微小^①。

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中日民间交流有了长足进展,积累了深厚的基础。中日人员往来从1972年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了2006年的450万人次。截至2006年,中日地方友好城市已有300多对,每周往来于中日间的各种飞机航班达540架次。中日文化交流十分活跃。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学子留学日本热潮经久不衰,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接受的外国留学生中所占比例长期占首位,以致如今在日本形成了规模约40万人的“新华侨”;日本也有越来越多的学子留学中国,截至2003年底,留学中国的日本学生人数已达16084人(同期居第一位的韩国在华留学生人数为36093人)。日本动画片和大众歌曲深受中国年轻一代喜爱,中国的古典文学和现代音乐也广为日本民众所喜欢。这种密切往来局面不仅在中日2000多年交往史上是首次出现,而且也在中国和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相比也都居于前列。

然而,与上述中日经贸关系与民间交往轨迹呈现出的上升曲线背道而驰,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以及相互民族感情的演变轨迹却勾勒出了持续恶化的下行曲线。21世纪初期的中日关系呈现出了两重性的强烈反差:一方面,日本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但另一方面,日本又是最不确定且又日益强硬的政治与安全领域对手,以及最敏感的民族情感因素与交流对象。近年来,因日本决策层不断做出美化侵略历史的举动和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干预姿态,以及中日两国在领土、海域、安全、资源等现实利益问题上不断发生碰撞,导致了“历史问题”与“现实利益”的恶性循环,使中日关系呈现出“政冷经热”的矛盾特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就开始以“政治冷、经济热”一语来概括冷战后中日关系逐渐显现的双重特性。近年来,中日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概念。中日间出现的

^① 关于中日经贸关系的全貌,详见本书第五章。

经贸关系持续发展、政治关系波澜起伏的“政冷经热”局面，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加深有利于政治关系的加强”这一国际关系的一般命题提出了挑战，从而也对每个从事中日关系的研究与实际工作的人员提出了揭开其中谜团的课题。

如何诠释“政冷经热”这一颇为令人困惑的现象呢？

究其根源，这一现象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日两国的政治目标相互矛盾、经济目标相互重合、政治关系与经贸关系相对分离、两大领域发展失衡而导致的结果。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日政治关系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转折期，两国在规范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上不断出现矛盾与摩擦。其基本形态是：（1）日方不断冲击 1972 年以来两国就历史、台湾、领土等主要问题形成的政治原则，中方对此做出适度的回应；（2）中日围绕“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的摩擦出现恶性循环局面；（3）两国民众的相互感情和舆论氛围不断恶化，这又对两国政治关系形成了负面牵制，导致了“政治关系”与“舆论环境”的恶性循环。

中日政治关系进入新的转折期，具有国际环境演变、中日国内条件变化以及相互作用方式转变等多层次的原因。

国际环境变化是导致这一新局面的外部原因。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美国逐渐把中国视为东北亚地区的下一个主要潜在对手，开始加大“扶日抑华”的力度，日本的对华政策也随之渐趋强硬。特别是 1994 年以后，美日两国不断加强排他性的双边军事同盟，特别是日本不断强化对美军事支援态势，增大了对中国安全环境的负面压力，恶化了中日安全互信氛围^①。

日本国内政治变化是中日关系出现新局面的重要原因。随着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的衰落，日本政界出现了“总体保守

^① 关于中日关系面临的国际环境，详见本书第二章。

化”趋势；随着吃“美式黄油”长大的“战后新生代”成为各界主流，对中日关系史缺乏了解、对侵华历史及中日睦邻友好的意义缺乏认识的新一代势力开始掌握日本各界的主导权。在此背景下，否认侵略历史、主张遏制中国、要求摆脱“历史赎罪意识”的右翼鹰派势力逐渐占据政界主流，中日在历史、台湾、领土等问题上形成的政治原则不断受到这股势力的冲击，日本的报刊、电视等大众媒体和社会舆论总体上向右转，对华友好势力衰退，对华舆论环境恶化。

中日两国相互条件的变化是中日关系重新调整的双边基础。

其一，中日国力对比出现新趋势。中日经济发展势头出现“中盛日衰”之势，两国对外战略出现了“中稳日急”之差，以中国国力逐年追赶日本为背景的“两强竞争”局面初露轮廓。在这一趋势下，中日相互心理出现复杂局面，2000年的“中强日弱”、150年的“日强中弱”、复交以来的“中日友好”、近年来的“政冷经热”以及舆论和民众感情恶化等因素的合力，促使中日关系在理性与情感、历史与现实之间震荡和摇摆。

其二，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进入“漂流期”。20世纪70～80年代那种在“共同抗苏”战略下形成的向心力业已消失，美国“分离中日”策略的负面因素增大，中日围绕历史认识、发展战略、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的相互竞争逐渐上升；与此同时，中日相互作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1972年以来形成的以“最高领导人的决断”、“重要人物的沟通”或“友好渠道的影响”等方式解决政治摩擦的交往机制日益衰退，适应两国关系新局面的新型交往机制则尚未成熟起来。

其三，中日舆论环境出现新局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日两国的媒体和舆论对本国政治与外交的影响日益加大，其相互间的影响也日益密切化、复杂化、敏感化。20世纪90年代前期，先是日本“战后新生代”开始掀起对中国说“不”的舆论浪潮。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岗位民营化、生活富裕化、信息因特网化、言论多元化的进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代”、“因特网一代”乃至“独生子一代”开始对日本的强硬姿态

做出强烈反应。以“历史问题”为例,先是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们喊出“超越‘赎罪意识’”的口号,掀起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浪潮。对此,中国的年轻一代深感震惊和愤慨,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以来掀起了反击浪潮^①。

其四,中日相互作用的范围不断扩大。中日相互作用的区域性和全球性不断提高,两国间的双边关系正逐渐融入多边国际体系,因而越来越受到国际局势和舆论的制约和影响。中日政治关系的持续冷淡局面正越来越引起东亚各国、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地区各国的广泛关注和关切^②。

中日是同处“东亚”这一地缘政治区域的两个大国。在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东亚“华夷体系”的中心国家,日本则是这一体系的边缘国家(晚清中国人称日本为“蕞尔小国”)。19 世纪后半期以来,日本迅速上升为东亚最强国,中国则沦为贫弱的边缘国家,经受了百年屈辱。20 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政治大国化和日本的经济大国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大国化趋势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趋势则又日趋明显,在其交汇点上开始碰撞出“两强竞争”的火花。

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曾经相互交替地占据了同一东亚地区的中心国家地位。因此,当今两国的大国化趋势并不完全属于“新兴大

① 相对于早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而言,中国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形成方式的变化速度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尤为显著。中国民众 2003 年在网上签名抵制日本企业参与京沪高速铁路建设、2005 年签名反对日本“入常”以及上街游行抗议日本歪曲侵略历史,皆是其例证。目前,中国的新闻媒体数量名列世界前茅,2006 年底因特网用户已达 1.5 亿,手机用户已达 4.61 亿,这些都已远远超过日本。在中国,接受信息和发表意见的条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局面,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等刺激性动作很容易激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应。

② 2005 年以来,笔者应邀与美国、欧洲一些国家、韩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学者和外交官进行了大量学术交流,从中强烈地感到中日关系问题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关切。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政府高官、学者、主流媒体以至布什总统本人,也都屡次表示了对中日关系的忧虑和对日本不能正视侵略历史的批判态度。

国崛起”的范畴，而是都带有“老牌大国复兴”的意味。目前，中日双方都认为对方重建以往那种“华夷秩序”型或“大东亚共荣圈”型的地区秩序是断难接受的。当这两个东亚传统大国在同一地缘政治范围内同时走向全面复兴，从而同时呈现大国化趋势时，其相互关系并不存在现成的历史经验、心理记忆以及双边模式可循。这种情况大大增添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竞争性。

首先，两国的战略走向相互重叠和碰撞。在历史与现实因素影响下，中日两个民族相互间都抱有由优越感和自卑感交织而成的强烈的竞争意识。如今，中日双方都面临如下困境：如何对待对方的“崛起”？如何认识自身的“崛起”对对方心理造成的压力？能否降低因双方都想通过牺牲对方来实现己方利益而付出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代价？能否减轻因相互猜疑对方战略意图而出现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概言之，中日将如何解决“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带来的竞争、对立乃至对抗的问题，以及能否走向基本的“双赢（plus-sum 或 win-win）”结构？可以说，伴随着大国化趋势而发生的“两强竞争”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如果双方对减少因过度竞争而付的代价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有可能努力把这一竞争共同管理和限定在可控范围内，并为逐步走向基本“双赢”的新型战略关系框架而共同努力。

其次，历史问题引发了新一轮民族主义冲突。日本右翼鹰派政治势力正把摆脱二战后体制、挑战和改写二战结论、摘掉战败国和侵略国的帽子作为走向“普通国家”、重振“民族精神”的途径。这一动向直接损害着曾深受日本野蛮侵略的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立国之本，极大地伤害着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势必遭到这些国家的坚决回击。这股势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日本的决策，将是判断未来中日关系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毋庸赘言，如果日本决策层执意要背离反省侵略历史的轨道而选择一条挑战历史结论的“崛起”道路，那将是一条持续恶化日本与中国等亚洲邻国关系的道路，也是一条注定走不通的险途。

再次,陈旧的冷战战略观念导致利益争夺。日本右翼鹰派政治势力正在渲染“中日体制差异”、“日美共同价值观”以及“大陆势力与海洋势力的对立”等陈旧的冷战观念,提倡“挟美制亚”、“联美抑华”战略,在台湾、领土与领海以及东亚区域合作等问题上向中国步步紧逼,急于抢占战略先机和制高点,争夺实际利益,寻求提早摊牌。

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执政势力在历史、台湾、安全、领土与海域、经贸、周边关系等关键、敏感的问题上屡屡挑战中日关系政治原则,是中日间形成“政冷”局面的主要根源。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自2001年4月上台以来连续六次参拜了供奉有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五年以上。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中日关系陷于“政冷”局面的最主要原因。除此以外,日本政府审查通过歪曲侵略历史的右翼版本教科书、一些日本阁僚和执政党政要不时发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妄言”,也是引发摩擦、恶化两国政治关系氛围的重要因素。

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界的“台湾帮”正在推动日台关系升格化进程,对“台独”势力给予鼓舞、声援和协作。2005年2月19日,日美“2+2会谈”(由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日本外务大臣和防卫厅长官组成)后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竟把“台湾问题”作为其共同关心事项,其干预台湾问题的手法呈现出由以往的“模糊化”转向“清晰化”的苗头。

在安全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一直在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其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联美抑华”。2004年以来,日本加大了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力度。如发表“中国攻击日本的三种可能性”,透露“中国入侵日本情况下的作战计划”,首相、阁僚和执政党上层人物们不厌其烦地游说欧盟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在每年版《防卫白皮书》和2004年版新《防卫计划大纲》里写入“中国威胁论”的内容,直至2005年2月19日的日美“2+2会谈”后

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对台湾问题进行粗暴干预,对中国的防御性国防建设说三道四。2005年11月普京访日时,小泉竟然又游说俄罗斯“慎重处理”对华军售问题。

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下简称钓鱼岛)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违背中日间在1972年达成、1978年再度予以确认的“搁置争议”的共识,先是打“民间牌”,纵容右翼团体登岛制造“实效控制”的事实;近年来则转由政府直接出面从所谓日本民间的“岛屿所有者”那里“租用”岛屿;2005年更是把右翼团体建造的灯塔“收归国有”,企图以这种单方面撕毁两国共识的行为来强化对钓鱼岛的“实效控制”。

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在两国间无争议的本国海域进行的油气田开发活动横加指责,并扬言将在其单方面主张的“专属经济区中间线”以东的海域进行能源勘探,其政界甚至出现了要以舰艇为日本勘测船护航,乃至不惜对中国船只动武的主张。

在周边关系领域,日本以经济、政治、安全、文化手段多管齐下,试图拉拢韩国、东南亚各国、印度、中亚各国、蒙古、俄罗斯等国形成围堵中国之势。

目前,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正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期。日本则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就已完成了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把工作重点转向旨在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形象的“政治大国”战略。

在此背景下,中日外交态势出现“日攻中守”局面,即日方急于打破现状,咄咄逼人;中方对此做出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应。在“政冷经热”格局下,在改善政治关系方面中方比日方更加主动,在经贸关系上则首次开始出现日本对华依赖程度大于中国对日依赖程度的局面。

日本的对华姿态何以如此咄咄逼人?笔者认为,其原因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条。

第一，政界右倾化、保守化和成为政治大国的梦想，是其行为的主要内因。日本右翼鹰派势力把否认侵略历史、抹杀二战罪行作为重振“日本精神”、重塑大国地位的途径。这股势力把中国视为日本崛起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而极力制造反华舆论，在国际上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在对华关系上摆出了“不怕摩擦”的强硬姿态。

第二，美国的“联日抑华”战略是其行为的主要外因。日本自认为有恃无恐，“狐假虎威”，借美国之力抑制中国，控制东亚。然而，2005年下半年，美国各界也开始对小泉内阁的对邻国强硬外交担忧起来，表现出了试图充当中日间调停者的姿态^①。

第三，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是其行为的心理基础。日本以“非上即下”的观点看待国际关系，一方面，卑躬屈膝于以武力摧毁了其反抗意志的美国脚下；另一方面，始终瞧不起贫穷落后的亚洲“恶邻”。如今，面对中国国力的快速增长，日本在心理上难以接受，也无法适应，必欲与美国一道将其遏制于“未然”。

第四，不善妥协、漠视宽容的岛国心态是其行为的文化基础。日本四面环海，近代以前很少与外界接触，缺乏相互接壤的大陆国家数千年来处理疆界纷争的经验。体现在与美国、俄罗斯、韩国、中国等国的领土问题上，日本表现出寸土必争、绝无妥协的强烈的国土意识。

第五，崇尚武力、急于摊牌的焦躁感是其行为的驱动力。2005年11月，日本自民党已提出了旨在为走向对外干预型军事大国扫清障碍的“改宪草案”，防卫厅及有关议员、学者组成的“防卫族”在日本政坛和社会舆论中的地位与影响日益上升，“文官控制武装力量”的制度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日本正欲脱离和平发展轨道而重新迷恋于“以武力解决争端”。

第六，极端民族主义抬头、舆论日趋一致是其行为的社会根源。

^① 20世纪80年代，日本决策层试图探索一条平衡中美、充当调停者的道路。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却倒退到了“挟美制华”路线。而今，美国各界竟出现调停中日关系的动向，这不能不说是令人称奇的变化。